

“后张居正时期”万历朝中枢政局动态探析

张鑫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利用内监及文官集团中“反张”蓄积已久的潜能,形成一股政治合力,迅速完成了权力过渡时期的中枢力量更替,巩固了皇权,又通过清除张居正、冯保及其政治势力,完成了对朝廷中枢政治格局的改组。这一系列举动,保障了皇权的集中与威势,但加速了朝局的动荡,消解了此前一度被强化的内阁政治影响力,也加快了明中后期政治经济由中兴趋向衰败态势的形成。

关键词:万历朝;中枢政局;内阁;言官

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5-0076-05

长期以来,学界针对张居正及其改革的功过利弊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到其主政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等诸层面,将明代政治史、制度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①但相关研究领域依然有其进一步拓展深化的空间,特别是张居正的去世对当时朝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及变化,有待更细致的梳理分析。因此,笔者将重点考察“后张居正时期”(明神宗亲政初年,1582年~1584年)万历朝中枢政局变化的脉络与得失,以求教于方家。

万历十年(1582)六月,“秉政”十年的首辅兼帝师张居正溘然逝世,万历朝中枢政局也随之迅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亲政后的明神宗借助内监及文官集团中受张压制、钳束已久的成员的力量,遏制内阁,严防再次出现“张居正式”的强势首辅;另一方面,循序递补的张四维、申时行又极力维持着内阁权威,为明神宗“君逸臣劳”式统治积极“背书”。朝廷中枢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势力更迭和权力重组,各方政治势力展开激烈的权力博弈,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一、皇权复振,乾纲独断

明神宗与张居正的君臣一师生关系,由“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1](P179)},继而演变为“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2](P2819)},其端倪早在万历六年(1578)二月皇帝大婚之后,似便有迹可循。^②尤其是在万历八年(1580)十一月发生的“罪己诏事件”,致使神宗“虽在冲龄,心已默忌”^{[3](P42)},在“愤结之日久矣”^{[4](P325)}后,日渐显露。故张居正一去世,神宗便迫不及待地 from 幕后走向前台,孔张皇权,独掌乾纲。

万历十年(1582)九月六日,张居正去世,尸骨未寒,神宗即颁布诏书:“各省直清丈田粮……不许概行覆丈,反增劳扰。”^{[5](P382)}率先中止了张居正极力推行的田亩清丈改革。神宗还大力笼络张四维、申时行等后继内阁辅臣,支持他们启用了一大批“海内正人为(张)居正所沉抑者”^{[6](P400)},并通过他们重塑政治格局,强调“今海内厌苦操切久矣”,“稍以宽大从事”^{[7](P402)},力求“荡涤烦苛,弘敷惠泽,俾四海蒸

收稿日期:2019-12-16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学术出版基金项目“明代武官监控体系研究”(2020XJ65)

作者简介:张鑫(1986-),男,安徽芜湖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① 参见冯明《近三十年来国内张居正研究综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王玉德、黄永昌《近五年来张居正研究综述(2000~2004)》,《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② 参见韦庆远《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734~735页。

黎,咸戴帝德”^{[6](P399)}。由此,朝中一反张居正生前执政时综核名实、严申纲纪、明刑峻法的政风,预示着一场权力格局的重大变更即将到来。

为尽快从张居正、冯保的阴影中走出来,神宗暗自催促科道官员充当马前卒,发起“倒张”活动。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江西道御史李植、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便先后呈上奏章,严辞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十二大罪、前内阁首辅张居正十四大罪,痛斥二人“藐皇上于冲龄,残害忠良,荼毒海内”^{[2](P2802)}。疏上,神宗决然抛弃了曾经与张居正朝夕相处的“师生情”和儒家教育传统的“致中和”,喜形于色地直言:“吾待此疏久矣。”^{[8](P4426)}并指使张鲸、丘橓等人,迅速对张居正、冯保开展清算和整肃行动。冯保、张居正及其家人亲属,包括亲信、门生随即遭到严惩,这些人或被拘禁,或遭显戮,或受罢斥,迅速“败亡殆尽”。^{[9](P141~143)}从此,内阁辅臣多仰承圣意,威势大幅下落;司礼监、东厂等内官机构也同样被控驭极严,“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10](P7814)}。

在解除“政治监护”之后,神宗在国家治理上开始一展拳脚,意欲有所作为。万历十一年(1583)九月,吏部、兵部按例推升宣大总督郑洛为协理京营戎政、四川巡抚孙光裕为南京大理寺卿。神宗批准了对郑洛等人的任命,但对朝廷按资历推选任官的理念颇不以为然,他宣布:“今后但凡各处要紧事情重大的,不必以资格历俸为则,必须推其堪任的用。”^{[2](P2636)}为进一步强化对朝廷选官用将的掌控,神宗甚至破天荒地恢复了已中止近百年的“辅臣平台诏对之典”,重点讨论边疆大吏的选拔任用。他强调:“将才甚难,非经战阵,何缘识别?”所以,他不同意直接从中央选官“空降”到边疆独当一面,而是要从地方主官中考察遴选,“果有异才,许以例荐外,特举推用”^{[2](P3005)}。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京畿地区久旱无雨,神宗亲率文武百官,步行往返二十里,赴南郊祈雨。九月,神宗又力排众议,提拔徐贞明为尚宝司少卿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奉敕令在京畿地区垦荒拓田,次年二月得水田两万九千余亩,极大地缓解京师用粮的压力。^{[6](P639)}这一系列举措,固然表现出了神宗在亲政初期对选贤任能、民众疾苦的关心和重视,但在决策间又明显地表现出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负面性格,再加上其在对张居正、冯保等人的处置上贪心过重,操作过急,手段过酷,致使一股明知其非却不敢匡救的避祸心态在官僚系统中蔓延成风。

更为不堪的是,神宗在亲政后不久,即颁谕“采

民女三百人,年十五下者”^{[8](P4434)},其后又频频假借诞育皇子皇女、拜谒皇陵、赏赉随员、太后圣诞、皇弟之国等各色名目,直接诏取太仓及光禄寺存银。同时,他还特地指派内官出宫外镇,如以太监田玉“提督太岳太和山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2](P2584)},并命“太监张宏阅视京营”^{[11](P223)},甚至下诏在内廷练兵,“聚三千之众,轻以凶器尝试于清严之地”^{[11](P249)}。总之,神宗对皇权的急剧扩张,不仅无法实现其励精图治的政治追求,反而更多地暴露了自己在治理决策上的稚嫩和短视,留下了所谓“去留皆出独断云”^{[2](P2404)}的自负口号。这对疆域如此辽阔、人民如此众多的朱明王朝而言,是一场灾难。

二、内阁缠斗,衣钵相传

张居正在去世前企图通过遗书“密荐”的方式,援引冯保的座师潘晟入阁,以维系其所谓的“改革遗产”和“政治势力”,但遭到了张四维、申时行的联手阻止。他们鼓动科道言官雷士桢、王国、王继光等连章弹劾,最终成功迫使潘晟以“新衔致仕”^{[2](P2337)}。但正当张四维“拟上诏书条格,罢铸钱、丈田之令,欲以渐罢政事不便者”^{[12](P822)}之际,张居正的“余党”王篆、曾省吾等人,则积极拉拢次辅申时行,暗中组织反扑,并唆使御史曹一夔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并元辅张四维”^{[2](P2404)}。神宗为了安抚张四维,亲自派内监赴张宅宣旨,慰留其复起视事,孰料“命甫下,御史张问达复劾(张)四维”^{[6](P400)}。窘迫异常的张四维一方面不得不厚贿冯保以求自保,另一方面猜忌是申时行“与谋也,卒衔之”^{[6](P400)},“乃与门生在言路者谋攻(申)时行”^{[13](P1908)},暗中运筹新一轮的内阁权争。对此,次揆申时行不得不喟叹:“吾尚可以默乎!”显然,他已经敏锐地觉察出了朝廷中枢政治格局的最新动向,遂积极配合张四维,“尽发冯保、徐爵诸人与外廷表里为奸状”,并票拟冯保远斥、徐爵论死,才勉强取得了首辅的谅解,“乃佐蒲州(张四维),因人情而顺流,与之更始”^{[14](P684)}。

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山西道御史魏允贞又以“严科举之防”为由,讽谏张四维、申时行等内阁辅臣的子弟“宜照内外官引嫌回避事例”^{[2](P2512)},不得参加科举廷试。已有默契的张四维、申时行即刻联动,先后上疏申辩。不久,户部员外郎李三才复谏“辅臣子不宜登第”^{[2](P2517)},被神宗连降三级外放,不想此举竟引来了更大规模的上疏谏言,“六科十三道周邦杰、赵卿等,疏救御史魏允贞、员外郎李三才”^{[2](P2518)}。缠斗到四月,张四维惊闻老父病逝家

中,内外交攻,悲痛异常,黯然辞任返乡,丁忧守制。

张四维的去职,应该是“后张居正时期”万历朝中枢政治结构中的一大缺失。以政治的角度来看,张四维与张居正虽多年不合,但于政务而言,他是一个手段高明,谋略超人的官场高手;再加之宦海浮沉多年,门生故旧遍及朝野,树大根深,即便无法形成如张居正式的强势内阁,但对内廷如皇室、宦官,外朝如部院、科道等,仍可形成一定的制衡和约束作用。张四维的仓促离朝,迫使立朝根基尚浅的申时行不得不肩负起内阁首辅的重责。

申时行继任内阁首辅,在任时间为8年零4个月,在万历朝仅次于张居正的任期,有“虽早潦不常,夷狄时耸,而旋就底定,天下号为治安”^{[14](P682)}的美誉。在他执政期间,一方面尽反张居正过于操切肃杀、霸道强势的作风,“一切以宽大行之”,甚至不惜废除考成法,以凝聚朝中各方的最广泛共识和支持;但另一方面,针对胆敢否定反对他执政的政治势力,他也主动予以回击,成功遏制了要求进一步削弱或虚化内阁政治权威的声浪,重塑了内阁在中枢系统的政治地位和角色。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张文熙针对性地提出“部院各衙门,不当置考成簿送阁考查”,“吏兵二部升除,不当一一裁取”,“各处督抚巡按,不当密揭请教”,“票旨不使同列与知”等“阁臣专恣者四事”,申时行逐一予以强硬回驳。神宗为了依靠内阁来维持中枢运转,摆脱日渐繁杂的国家政务,所以大力支持并肯定了申氏的意见,“朕方以大政悉委卿等,勿以浮言介意”,“阁事照旧行,宜殚谋协恭,一副朕至意”^{[1](P463~464)},有力地维护了内阁在朝廷中枢的政治地位。

此外,与以往波云诡谲甚至血雨腥风的内阁权争相比,由申氏所主持的内阁基本保持着和衷共济、鼎鼐调和的稳定局面,而后任首辅也多承其栽培举荐,“(申)时行为首辅。余有丁、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先后同居政府,无嫌猜”^{[10](P5748)}。这无疑是申时行为稳定“后张居正时期”中枢政局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未致国运“中道竭蹶”,但也为明代后期内阁政治埋下了深刻的隐患。

在这届内阁中,余有丁、王锡爵与申时行为同科“三鼎甲”,被誉为“皇明盛事”,王家屏、赵志皋、张位也为进士同年,而许国、王锡爵与申时行同为南直隶“乡党”,许国、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张位则又都由申时行力荐入阁。正是由于内阁首辅与群辅之

间,因学缘、地缘、事缘等多种因素交织起或明或暗的政治关系网络,再加之申时行“性柔和”,不像张居正待阁僚如部属,得以构建出这届内阁互敬互信、团结合作的融洽局面,“时论称其得人”^{[14](P684)},实为明代内阁政治中所罕有。

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明朝中后期内阁辅臣之间“传衣钵”式关系的异化发展,不仅无法继续维护内阁和朝局的稳定,反而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砝码,进一步劣化了朝廷的政治生态,加剧了朝野的政治斗争,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时人曾指出:“自申瑶泉(时行)以后,递而下之,王荆石(锡爵)、张洪阳(位)、赵澱阳(志皋)、沈蛟门(一贯)、朱金门(赓),其术巧,其党同伐异,诡托于官府之内,而人莫之能测。”^{[15](P7~8)}

三、部院更迭,全面改组

六部尚书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在明代合称“七卿”,“古称文昌政本,七卿之任,盖其重矣”^{[10](P5808)},在朝局中足以与内阁相抗衡,“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骋意见”^{[10](P3395)}。如果说皇帝和内阁辅臣构成了明代的“中枢大脑”,那么六部和都察院就是“传导神经”。只有当“大脑”与“神经”连为一体,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号施令”。基于此,神宗亲政伊始,便大刀阔斧地调整了“七卿”的人事任命,极力清除张居正在朝中所遗留的主要势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七卿”的调幅便高达57.14%,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七月调幅更是接近了100%。^{[10](P3475~3477)}

此次“七卿”班底的大更迭,吏部首当其冲,先后经历了4任,才完成最终调整。吏部被尊为“天官”“冢宰”“太宰”,位高权重,为百官表率、六部之长,“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16](P52)}。而时任尚书王国光正是张居正的政治“密友”,被其誉为“与吾共图国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见”^{[17](P703)}。其他如张学颜、梁梦龙、徐学谟、曾省吾、陈爌等辈,或为门徒或为属吏或为党附,亦均以张居正马首是瞻。对此,神宗逐一予以迅速调离或调整,新启用的各部院首长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而前两类又占据了主流:其一是以“反张”著称,资历深厚者,如在张居正当国期间,“尚书不附丽者”的严清、“雅不相能”的王遴、“以(张)居正操切,颇訾议之”的赵锦;其二是简在帝心、特旨拔擢者,如“素厉清操,有时望”的杨巍、“进

止有仪，帝目属之”的舒化；其三是“张党”中确有其能暂任其位者，如善理财的张学颜、善治河的潘季驯。^①

经此改组，“（张）居正诸所引用者，先后斥削殆尽”^{[13]（P1907）}，神宗亲政初期的朝局风貌也为之一变，中央权威重归皇帝，内阁再无“江陵柄政”，部院也不再“恂恂若属吏”，被时人颂为：“今皇上乾纲高照，励精图理，百僚奉职，四海响风。”^②尝到皇权独享甜头的神宗，在事后亦不无得意地宣称：“如今用人，哪一个不是朕主张？”^{[5]（P653）}

四、言路伸张，物议汹汹

当初为了尽快肃清“冯张政治联盟”在朝势力，神宗重用提拔了一批“倒冯反张”的急先锋，其中尤以颀颜卖力、无耻搏击的御史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为最。三人均由神宗特旨从七品连升六级，“俱于京堂不次升用”^{[2]（P2806）}。如此异乎寻常的宠幸和奖擢，实际上是神宗“欲骤贵之，风示廷臣”^{[6]（P595）}，以凸显出专制皇权在政治立威、利益筹庸、权力分配上的至高无上。史家万斯同对此进行了精妙而深刻的心理分析：“（张）居正初败，言路张甚，（万历）帝亦心疑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发之以杜壅蔽。”^{[6]（P424）}

从此一度被张居正强势压制的言路大开，言官大伸，各方势力纷纷拉拢纠集科道言官结党营私，彼此攻诘，导致朝局派系林立，纷扰不息，莫衷一是，党争之患日甚一日。神宗本人很快就尝到了自酿的苦酒。仅以万历十一年（1583）元月为例，各路言官累计奏报弹劾26人次、论事30余条，上至监阁部院下至司道卫所，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教育等国家方针政策诸层面。相继主政内阁的首辅张四维、申时行也频频遭到言官弹劾。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十一年至十九年（1583～1591），申时行被论劾累计22人次，主要涉及有以下几个方面：质疑其政治操守和能力，如包庇亲属、擅权纳贿、治国不当等；强调其内阁目前的权力僭越“祖制”有碍“政本”；指责其在“争国本”中推卸责任。^③

在以科道言官为代表的中下级官员的围攻下，

内阁重臣动辄得咎，凡举一官必究其失，凡兴一政必言其误，罔顾国体，不论是非，但凭好恶，“党论之兴遂自此始”^{[6]（P590）}。导致辅臣们不堪重负，往往“一玷清议”便不屑申辩，直接挂冠而去。内阁次辅许国曾不无愤慨地指出：“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18]（P145）}神宗也极感厌烦，对长篇累牍的言官弹劾直接斥之为“此套子耳”“不过欲沽名尔”。这种非理性的对峙严重削弱了中枢政局的稳定性，造成了君臣之间、阁部之间、部院之间，乃至群臣之间情绪上的焦躁和政治上的对立，迫使中枢决策运转机制渐趋失序、失焦、失效，直接促成了神宗在统治中后期“章奏一概不省”“员缺一概不补”的荒怠之局，为日后内阁政治转型的困顿和王朝的覆灭埋下了深刻的隐患。

五、结语

明代内阁自创立以来，经由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政治权力和地位已远非皇帝“顾问”所能涵盖，“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遂有首辅之称。凡一时政治得失，往往视之为轻重”^{[19]（P421）}，涌现出了如杨廷和、张璁、徐阶、高拱与张居正等一班卓有政绩的内阁首辅。他们的执政施策不仅弥补了皇权在实际运行中的缺失，同时也保证了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嘉隆万新政改革”的出现，无疑是明代内阁政治成熟稳定的集中体现和有效产物。

张居正逝世后，朝中权力格局为之大变，明神宗通过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铁腕手段，迅速瓦解了张居正、冯保及其附属所结成的政治联盟。这标志着万历朝中枢政局进入了“后张居正时期”，也预示内阁不会再出现“张居正式”的强势首辅。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神宗展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智慧和魄力，也颇具励精图治的勤政气象。但他在急剧恢复和扩张皇权的同时，却不愿承担治国理政的艰辛劳苦，所以不得不重新适度维护内阁作为朝廷政务中枢的地位和功能，企图为自己怠政享乐披上“君逸臣劳”的理论

① 参见万斯同《明史》卷306《赵锦传》，卷307《王遴传》《严清传》，卷312《杨巍传》，卷313《张学颜传》，卷314《潘季驯传》，卷331《舒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册。

② 参见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7页。

③ 参见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钱一本《万历邸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88年版；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夏燮《明通鉴》，中华书局2013年版。

迷彩和制度外衣。

在“倒张运动”中受益最大的科道言官,并没有完全认清当前政治情势的动态变化,仍一厢情愿地提出“共治”的诉求,这显然不符合当时中枢政务运作的现实,也无法满足明神宗的执政依赖,更触及到内阁群辅的权力和利益。因此,明神宗对言路纷扰、朝野对立带来的危害有着极其冷静清醒的判断,三令五申要求科道“慎言”的谕旨比比皆是,甚至不惜“无差别”全员罚俸。遗憾的是,颇富政治智慧的神宗不具备“元辅张先生”的政治魄力和改革方略,在遏制言路无果后,直接由洞若观火渐转为隔岸观火,逐渐沉溺于后宫的歌舞升平,直至在位中后期“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力,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20](P805)}。自此,朝廷中枢的政务调节及整合之职能,开始不断地失调失守,“科场案”“楚宗案”“妖书案”“京察案”“挺击案”等大案迭兴,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诸党群起,朝廷进一步滑向朋党派系混战,内阁政治亦转向“衰敝期”。《明史》论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朝这段于“后张居正时期”所发生的中枢政局动态,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注脚。

参考文献:

[1]南炳文,等.辑校万历起居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2]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于慎行.谷山笔麈[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李翊.戒庵老人漫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吴亮.万历疏钞[A].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58 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6]万斯同.明史[A].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329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申时行.赐闲堂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34 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6.
[8]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张毅.试论万历年间的“倒张运动”[J].求是学刊,2009(1).
[10]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钱一本.万历邸钞[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12]王家屏.条麓堂集[A].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351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夏燮.明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9.
[14]焦竑.国朝献征录[A].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525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5]吴应箕.东林本末[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16]申时行,等.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张居正,等.张居正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18]黄景昉.国史唯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9]纪昀,等.嘉靖以来首辅传提要[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452 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20]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

An Analysis on the Dynamic State of Central Political Pattern over the Reign of Wanli in the Post-Zhang Juzheng Period

Zhang Xi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Abstract: After the death of Zhang Juzheng, the emperor Shenzhong of the Ming Dynasty made use of the long-accumulated potential of “anti-Zhang” in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 service group to form a political force, which quickly completed the replacement of central forces during the power transition period, consolidated the imperial power and complete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pattern of the court by eliminating Zhang Juzheng, Feng Bao and their political forces. This series of actions undoubtedly guaranteed the centralization and prestige of the imperial power, but at the same time accelerated the turbulence of the imperial situation, dispelled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cabinet which had been strengthened before, and also accelera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tren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cline from resurgenc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reign of Wanli; central political pattern; cabinet; imperial censors